

导 言：

## 在国难中觉醒

“觉醒”一词，系相对于“酣睡”、“酣梦”而言。“觉”与“醒”在“觉醒”一词中本属同义的重叠。“醒”即指梦觉、醒悟。韩愈《东都遇春》曰：“朝曦入牖来，鸟唤昏不醒”；贾谊《新书·先醒》云：“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其中“醒”即含梦觉、醒悟之意。“觉”义与“醒”相近，既有省悟、知觉等意，也有睡醒、醒悟之意。例如，《庄子·齐物论》有“觉而后知其梦也”；《诗·王风·兔爰》称“逢此百忧，尚寐无觉”，其中“觉”即指睡醒、醒悟而言。

个人的“觉醒”既有引申之义，也不排除自然描述之义，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觉醒”只有引申意义可言。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既是指近代中华民族逐渐摆脱自身沉湎于小农文明的沾沾自喜状态，重新认识世界和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又是指中国人民为争取独立、自主、富强、进步而进行的观念更新的过程。

在前一个过程中，问题的关键是能否弄清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在世界或全球中的确切地位，能否弄清中国传统式的小农文明与日新月异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之间的差异和差距，以及采取什么办法尽快缩短二者之间的差距，尽快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近百年来，成千上万的先辈们怀抱赤子报国之心，以敏锐的思路和坚强的毅力，上下求索，艰苦奋斗，迸发了一朵朵光彩照人的思想火花，创造了一份份可歌可泣的历史业绩，还抛下了一张张未完的历史答卷与诸多遗憾。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民族觉醒的状态与程度是不一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充满血泪与希望的中国近代史就是处于近代社会的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历史，无论他们的“制夷”是出于自发，还是出于自觉，“制夷”的成效在较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制夷”的前提与手段“师夷”的成效如何。衡量各个历史时期民族觉醒的水平如何，“师”什么和怎样“师”，就成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参照系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他们还强调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智慧和生机的民族，当然不想灭亡，也不可能被人灭亡，但在其自身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定型的“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观念在较大程度上妨碍着自身在势不可挡的西方资本主义一体化潮流面前的自我调节和进取，民族觉醒的历程举步维艰。

在中国古代社会，流行着所谓“德华兽戎”、“以夏变夷”、“尊王攘夷”等观念。孟子所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影响可谓久远。应该说，“未闻”并不等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未有。只认可“用夏变夷”却反对“以夷变夏”的卫道士早已忘记他们所捍卫的东西原来就只是多民族融合之后的文化混合体，所奉为华夏正宗之物本身就含有“夷”的成分，何来纯而又纯的变“夷”之“夏”？

长期以来，中华民族所遇到的“夷”，其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都明显低于中国，“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和“用夏变夷”等观念便以公式化的刻板效应长存于国人脑际，居高临下的朝贡体系和宗藩制度取代了平等互利的互相交往。当以英国侵略者为代表的西方不速之客用大炮和商品强行打开中国大门时，欲期“变成资产者”和“师夷长技”的国人首先遇到的便是思维障碍。每当大敌当前，率先肩负国家与民族的历史使命的往往是那些素以“内圣外王”之道自律、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开明的知识分子和爱国士大夫。高呼“师夷长技”的是知识分子中人，反对“师夷长技”最厉害的也恰恰是知识分子中人。尽管事实胜于雄辩，但在一个有着“名实之辨”与清谈传统的国度里，在一个由君主专制制度所派生的言官走红与“清议”横生的国度里，成年累月的朝野争辩往往可能颠倒黑白，使事实湮没于“雄辩”之中，甚或最终屈从于为意气所左右的口舌之争，反而严重地耽误了国人正视事实的大好时光。何况，一个高度君主专制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既“耳顺”又“眼顺”的国家，为数众多的顽固守旧者和投机取巧的“报喜不报忧”者是不愿正视和揭示那些由巨大的中西差距所派生的严峻事实的。仅此而言，近代中华民族觉醒的过

程将是一个曲折和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

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处于某个文明类型的核心位置的个体一旦转入另一个文明类型的边缘位置，其转入过程本身势必比原本就只是某个文明的边缘位置的个体的转变要难得多，其阻力也大得多。在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依托、以家庭为本位、以宗法关系和纲常伦理为纽带的东亚小农文明圈里，中国无疑处于其中的核心地位，一旦被强行拉入以机械化和专业化的工业经济为依托、以个体为本位、以市场和自由平等思想为纽带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边缘地带，其转变过程就显得比邻国日本这样原来就只是处于东亚小农文明的边缘位置，而且还是靠吸吮中国的唐、宋文明长大成人的国度着手类似转变要难堪得多。何况日本还是一个四面来风的东方岛国，它不乏学习外国（如中国）的历史。

在英国侵略者以征服者的姿态欺压中国人民之前，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小农文明自身是否已完全陷入危机状态而趋于死亡，还有待充分的论据来说明。如果单从理论上说来，不同类型的文明并无优劣之分，只存在差异。但在实际上，拥有坚船利炮的英国侵略者以虎门销烟为借口，向正义和善良的中国人民发起进攻时，两种不同质的文明的正面相遇与较量就不仅体现出差异，而且至少在物质层面上迅速显示出优劣来。英国侵略者的武力冲击，恰是少数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觉醒的契机。至于如何重新估价自身的小农文明，又如何对待外来资本主义文明的先进性，就成了实现民族觉醒与民族新生的前提性条件。只因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不是以和风细

雨的平等交往方式进行，而是充满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自私与残暴，欲期“师夷”，欲期虚心向强盗学习，国人除了存在由“华夷之辨”所派生的思维障碍外，还会遇到相应的感情障碍，以强盗为师原本就是一件异常痛苦和难堪的事情。思维与感情的双重障碍就决定了民族觉醒异常艰难。

另外，恋旧、怀古，崇尚经验，沉湎于昔日的历史荣光，喜欢靠回忆过日子，古今中西皆然，称为人之常情或人类的情性均可，只是以小农文明为主体的民族尤为突出而已。农业要求定居，畜牧业和商业则要求游动，定居者往往喜静而趋于保守，游动者多好动而容易变革。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整体上属于农业大国，其守旧风气颇浓，后人尽可为之惋惜，却不必为之大惊小怪，甚至随意菲薄和挖苦前人。

在后一个过程中，观念更新体现了民族觉醒的层次。以往的不少论著从“器物”变革（洋务运动）、“制度”变革（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文化”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三个阶段来概述民族觉醒的过程，可以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器物”的变革也罢，“制度”的变革也罢，都离不开观念的变化，都要求观念的变化开山导航。可以断定，如果没有对“华夷之辨”观念的适当纠正，就谈不上“师夷长技”方案的逐步到位，也就谈不上器物的变化与制度的变化。社会的变革固然经过了由器物到制度的变化过程，但以彻底清算传统纲常和更新观念为主要内容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不过是集中火力对前此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阶段的观

念变革重点补火而已，并不是另起炉灶。近代中华民族觉醒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近代中华民族不断更新观念的过程。观念的更新一般都是由浅入深，从感性到理性，由少数先进人物倡导的观念变化带动广大人民群众的观念变化，变为全民族的共同行动，推动和实现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变革，充当民族觉醒的催化剂和先遣力。

茫茫大地，警钟长鸣。万众一心，咸思奋起。民族觉醒的历程又是与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涨落紧密相连，而每一次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都凝聚着四万万人震天撼地的吼声，记载着民族觉醒的历史轨迹。

梁启超在晚年完成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对“时代思潮”有过精辟的论述：“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寢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所谓运动者，非必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不能分为谁主动、谁被动。其参加运动之人员，每各不相谋，各不相知。其从事运动时所任之职役，各各不同。所采之手段亦互异。于同一运动之下，往往分无数小支派，甚且相嫉视相排

击。虽然，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此种观念之势力，初时本甚微弱，愈运动则愈扩大，久之则成为一种权威。此观念者，在其时代中，俨然现‘宗教之色彩’。一部分人，以宣传捍卫为己任，常以极纯洁之牺牲的精神赴之。及其权威渐立，则在社会上成为一种共公之好尚，忘其所以然，而共以此为嗜，若此者，今之译语，谓之‘流行’；古之成语，则曰‘风气’。风气者，一时的信仰也，人鲜敢婴之，亦不乐婴之，其性质几比宗教矣。一思潮播为风气 则其成熟之时也。”

梁启超本人就曾是“以宣传捍卫为己任”的人。从戊戌维新运动期间的奔走呼号，中经 20 世纪初年高倡民权，从批判的武器抨击国民性的话题，再到 1915 年岁末号召国人声讨复辟帝制的北洋政府总统袁世凯，梁启超都曾是引导“时代思潮”的高手，与近代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等人可谓异曲同工。不过，由于常以“中等社会”自居的梁启超一班人对“下层社会”深怀偏见和恐惧，梁氏所说的“继续的群众运动”就不是货真价实的群众运动，而是常常局限在“中等社会”范围，把为数众多的广大劳苦大众排除在外。从广大劳苦大众中寻找力量的源泉，把民族解放运动看作千百万人的革命事业，引发一阵阵排山倒海的气势和摧枯拉朽的力量，则属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杰作，民族的觉醒与奋起正是在毛泽东等人的引航下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如同奔腾入海的黄河与长江，也有一个由缓到急、由弱到强的过程。它的源头活水就是新生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市场与力量。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近代国民经济中始终不占主导地位，即使在盘踞我中华大地的外国资本主义经济面前也是相形见绌，但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毕竟属于新的社会生产力，历史的进程虽容易漠视它的数量，却又不得不看重它的质量，不敢忽视它的存在。何况，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毕竟是从无到有；更何况，从四万万人身上进发出来的民族自卫、民族自强与民族自立的精神与力量不是任何外来的侵略势力和腐朽势力所能阻挡和扼杀的。

当微弱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刚刚破土而出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借助于甲午战败的历史话题，发动了一场以政治改革为中心的变法运动，进步势力与顽固腐朽势力都有了一个登台表演与公开较量的机会。尽管戊戌变法的失败使顽固腐朽势力占据上风，但民族觉醒与奋起的历史思潮并未就此泯灭。

当八国联军把新的屈辱与灾难强加给步入新世纪的中国人民时，举国上下齐思改弦更张，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借助于清政府被迫推行的“新政”而明显发展，以市场为纽带的新一轮民族主义陡然而涨。在本世纪前 30 余年的时间里，曾经出现三次民族主义的高潮。第一次以抵制美货运动和保路、保矿运动为标志；第二次以五四爱国运动、省港大罢工、北伐运动与废约运动为标志；第三次是 30 年代全民族

的抗日救亡运动。每一次民族主义浪潮与民族救亡运动，既是民族觉醒的阶段性标志，也是民族觉醒的阶段性成果。当全民性的抗日战争以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条件投降而宣告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蓄意发动的全面内战。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举推翻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历史将新一轮民族觉醒的使命寄托给中国共产党人。

中华民族百余年来不断觉醒的过程表明，中华民族毕竟是一个充满智慧与生机的民族，是一个不乏“知己知彼”传统和经世致用传统的民族，阵阵逼迫的民族危机驱使先进的中国人临危思变，寻找挽救国家与民族危亡的出路。尽管其中阻力重重，举步迟缓，但他们毕竟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了。正如国家主席江泽民 1997 年 7 月 1 日在首都各界庆祝香港回归大会上指出的：“列强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结合对中国人民形成的双重压迫，加深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和中华民族的危机，同时也唤起了全民族的觉醒，激发了广大人民的反抗。正是人民群众的这种觉醒和反抗，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是不以压迫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辩证法。”

## 第一章

# “天朝”遇上挑战

### 一、历史沧桑

#### 曾经辉煌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在神州大地上辛勤地劳作与繁衍生息，曾经创造过举世为之赞叹的古代文明，并且为人类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

古代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国家。先民们对农业投入最多，成效也最大，农耕技术的不断改进与积累，水利设施的大规模建设，既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也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江浙、两湖、广东、四川、江西等地都是重要的产粮

区，丝、棉、麻等重要经济作物区也早已逐渐形成。16世纪末叶，中国的农业生产水平还保持在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未尝没有相对的幸福可言。

手工业的发展在古代中国也是比较突出的，丝、棉、麻纺织业和陶瓷业、竹木工艺、榨油业等都有一定的规模和水平，江南盛泽镇与濮院镇的丝绸业、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广东佛山镇的铁器等都是遐迩闻名的，其产品远销海内外。对中国古代文明缺乏深切了解的许多西方人士误以为中国自古以来只有技术，没有科学，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宏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却不得不使这些西方人士大开眼界。作者从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出发，经过中西对比得出这样的结论：古代中国人的许多发明创造“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最令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疑当首推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与传播作为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尽管如今计算机的文字处理技术已经使毕昇的活字印刷术黯然失色，但毕昇在人类印刷史上的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导论》，1页，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位置毕竟是无可替代的，况且，造纸术的功用至今还是计算机等现代科学手段所无法替代的。火药的使用在摧毁欧洲中世纪封建城堡乃至整个欧洲封建制度的过程中发挥了举世瞩目的作用，而欧洲的火药技术也是从中国传入的。至于指南针的制作技术传入欧洲后，欧洲人用于航海，特别是用于 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乃至频频出击的殖民掠夺。此外，中国在天文、数学、冶炼、医学、造船等方面的科技水平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也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商业与对外贸易的繁荣提供了条件。17 世纪前后，虽然明清两代统治者实行海禁政策，对外贸易还是有所发展，中国的货物不仅伸展到周边邻国，而且触及非洲、欧洲和美洲。

绚丽多姿的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都凝聚着中国人民的智慧。自成体系的官僚政治、典章文物、价值观念等都与作为主体的传统农业经济相呼应，也曾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国力的强盛提供了保证。至少在公元 7—13 世纪，即唐、宋两朝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处于当时世界的前列。直至 17 世纪以后，西欧各国相继由封建社会转入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则仍然处在旧式小农文明中，才显得相形见绌。

## 夜郎自大

“当欧洲还笼罩在黑暗年代的阴霾之中，中国官员就已

精神抖擞，乘着装有指南针的轻便马车到各地去参观装置有固体燃料探空火箭的一些天文研究中心。一千年之后，欧洲科学家在发动工业革命时，中国官僚却还在迈着固有的方步。相形之下，他们已经不那么精力充沛了。”<sup>①</sup>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原本就是一种相对封闭、容易产生自满情绪的经济形态，光辉灿烂的古老文明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领先地位也容易滋生这种自满情绪。

以个体小农业和家庭小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一般只由性别与气候来确定产品的生产分工，即男耕女织与晴耕雨织，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直接生活需要，自产自销。“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

马克思在评述 19 世纪中期落后的法国农民时说：“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

<sup>①</sup> [美] 戴维·博达尼斯：《为什么现代科学在中国不曾发展起来》，载《国外社会科学》，1980（1），71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623～624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马克思还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

马克思对近代法国农民的这些论述同样也适用于鸦片战争之前乃至鸦片战争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农民。为数众多的中国农民既受自身发展方式的制约，又为个人生计所逼迫，他们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格局，另谋国家与民族发展的道路。历代专制统治者手持支配农业文明的行政权力，推行“重农抑商”的国家政策，强化“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在较大程度上压制着社会发展的生机。尤其自明朝中期以降，历代统治者推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严格限制人民的对外经济文化交往，朝廷上下以夜郎自大的心态沉湎于“天朝大国”的幻觉中，误以为中国就

是世界中心，其他国家都不过是像众星拱月一样拥簇在中国周围，“万邦来朝”，茫然不知新航路开辟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来西方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模样。

自明朝初期伊始，明朝政府就只准与本朝廷有朝贡关系的国家来华贸易，多次颁布禁止私人出海的命令，永乐以后虽时有放松，而正德末年至嘉靖年间又严行封海。清朝自顺治十三年颁布“禁海令”和“迁海令”，规定“片板不得下海”，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省的沿海居民一律内迁 50 里（一说 30 里）。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由于清政府统一台湾成功，海禁有所解除，清朝统治者允许中国商民出海从事贸易活动，但也不是毫无限制，清政府同意在广东澳门、福建漳州、浙江宁波、江苏云台山四处设立海关，允许外商入关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又对中外贸易控制甚严，仅开放“粤东一港”（广州），其余关闭。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 1842 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前。

明、清两朝的闭关政策除了封禁或限制通商口岸外，还有以下三项具体规定：

（1）限制出口物的种类和数量。清朝统治者严禁粮食（包括豆类）、铁器、硫磺、硝、书籍等产品出口，限制丝

在世界各地联系很少的古代，并非只有中国人认为自己所在国家或地区属于世界中心位置，在西欧就有人断言地中海就是地球的中心。随着天文学的革命性突破与西欧对外交往的增多，尤其是随着地理大发现与新航路的开辟，西欧人较早地放弃了自己的错误观念，中国则不然，直到戊戌变法前后，还有不少人死抱着中国乃“世界中心”的观念不放。

绸、茶叶、大黄等商品的出口量。为了杜绝粮食和铁器的出口，清朝统治者竟然规定每艘出洋商船只准带铁锅一口、每人只准带铁斧一把、口粮一升、余粮一升。此类规定，毫无道理。这是因为，海上风信，变幻莫测，航行本难定期。清政府这种极不合理的规定，剥夺了商船对海盗进行武装自卫的手段，而且在漫长的航途中，生活也得不到保障。

(2) 实行公行制度。公行是清政府特许与外商打交道的垄断性机构，明朝称“市舶司”，清朝称“公行”。公行包揽对外贸易，承销外来商品，代购国产出口商品，传达清政府对外商的照会，办理一切对外交涉，代理清政府管束外商的居住与行动，保纳税饷。未经公行之手的民间对外贸易活动都被视为非法而遭严惩。对于出洋的水手与客商，都要求每人佩带由官方定做的腰牌一块，在腰牌上刻明个人姓名、年龄、籍贯，以备巡哨官兵随时稽查。

(3) 对外商的居住和行动严加限制。清政府颁布“防夷五事”、“民夷交易章程”、“防范夷人章程”等，在广州专设商馆，供外国人居住，不准擅自出入，只有在每月逢八才准许在附近散步，每次不超过 10 人，并且需有公行的翻译（即通事）陪同。不准外国人在广州过冬，冬季来临时，外国人必须迁往澳门。不准外国人坐轿，禁止外国妇女进入广州城。禁止华人向外商借款或当差役，禁止外商雇人传递信息或直接与华商交易。清政府视中国的通用文字汉文为神奇法宝，连汉文的学习与传授也在严禁之列。如果华人私下向外国人传授汉文，严惩不贷。传教士马礼逊的汉文教师每次